

# 浅谈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因素教学

徐晨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重庆 401500)

**【摘要】** 全球化背景下，汉语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广泛，如何深入扩大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国际中文教育中进行文化教学虽然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文化于语言相互交织，语言教学不能脱离文化，但是文化的概念无所不包，无法全部作为语言教学的内容。因此本文从希望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因素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以及教学中文化因素选择的原则。

**【关键词】** 汉语的国际影响；“讲好中国故事” 探讨国际中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574(2022)14-00022-03

## 1 什么是文化？

提及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教学或是文化意识，文化都是中心。想要更好的理解何为文化教学和文化意识，那么有必要首先讨论一下其中的“文化”二字。汉语中，“文化”二字可以查阅到的最早的记录是出自汉代刘向所著的《说苑·指武》，书中提到：“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sup>[1]</sup>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只是运用武力征服，百姓口服心不服。如果不改变方略，以德治国，以文化之，迟早也会被别人同样以武力再次讨伐回来。可见这里的“文化”二字指的是文治和教化，也可以理解为用美好善良的品德和行为去教化百姓。

无论对语言教学，社会学领域或者其他相关学科领域而言，如何界定文化，都是关键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我们都无法给“文化”做出一个统一的或者所有人认可的定义。换句话说，如何界定文化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sup>[2]</sup>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抑或是各个领域的学者，都试图从不同的视角或者领域去界定文化，因此这个词才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理解。

英国人类学家E.B. Taylor对于文化的定义是最早从学术意义上对文化进行界定的学者，他在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将文化描述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可以发现，这个定义对于文化的理解非常广泛，它认为人类社会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可以称之为文化，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和观念精神。<sup>[3]</sup>

1982年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关于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此内容的基础上，这版词典进一步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文化不仅包括精神文化，也包括物质文化；相对而言，狭义的文化仅仅指的是精神文化。<sup>[4]</sup>除此之外《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文化一词的定义从文化一词使用的不同语境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首先，文化指的是人类社会发

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次，文化还是一个考古用语，指的是同一个历史时期内关于遗物和遗迹的综合体，相同的工具，用具和制造技术往往呈现出相似特征。<sup>[1]</sup>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三星堆文化，二里头文化。第三层含义指的是人们使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的知识。<sup>[1]</sup>从以上不同定义可以发现，《现代汉语词典》与《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及泰勒的定义都有相似之处，即承认文化至少应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内容。

## 2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

### 2.1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回顾前面提到的各国学者对文化的定义可以发现，人类社会中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创造都可以称之为文化。语言作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一大特征，自然成为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语言与文化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准确地说，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交融，语言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文化靠语言总结和传承。

吕叔湘先生也深刻地阐述过文化之于语言教学的重要性：语言是人们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工具。但如果在语言教学中就语言论语言，就语言教语言，对语言系统、语言要素和语言规则条分缕析、百讲不厌，“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sup>[2]</sup>语言教学中如果只看到语言，忽略了文化因素的培养，这样的语言教学强调了工具性却丢失了人文性。语言中的文化体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小到一个字，一个词。比如：将自己的文章成为“拙作”。不理解背后蕴含的文化思维，就不能准确恰当的使用这个词。扩展到句子、段落和篇章，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就更加不可忽视。<sup>[4]</sup>

### 2.2 从文化适应模式看文化因素

1978年，舒曼提出了文化适应模式理论。这一理论包括两组变量——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社会距离指的是二语学习者与目的语群体社会的关系，二者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近，则越有利于二语习得。

“社会距离”中与目的语文化密切相关的有以下几种因素：

1, 社会主导, 指的是二语学习者同目的语所在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差距, 差距越小, 双方社会距离越小; 2, 融入策略, 具体指的是二语学习者对目的语群体的文化的态度或者融和方式, 可以划分为同化, 保留和适应三种不同策略, 从这里可以发现, 若想要二语学习者或者本文讨论的汉语二语学习者适应汉语文化, 那么首先要让他们了解汉语及中国文化, 学习汉语的目的并非是要要求学习者全盘接受汉语文化而放弃自己的文化, 而是在了解汉语背后的文化的基础上促进汉语学习, 认同而不一定被同化; 这些因素相互联系, 影响着学习者的语言习得。[5]从文化适应模式思考汉语国际教育中的文化因素, 可以发现二语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与此密切相关。学习汉语, 如果不去了解汉语所代表的文化, 学习者就很难采取对汉语这种语言或者中国的适应和同化策略。

### 2.3 从动机看二语习得中的文化因素

根据加德纳对外语学习的研究, 他将外语学习的动机分为“工具性动机”和“融合性动机”两种类型, 其中, “融合性动机”可以理解为: 因为对目的语的语言, 国家或者文化感兴趣而愿意学习外语, 这类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更愿意与目的语国家的人交流, 并且可能更愿意积极地融入目的语文化, 因此他们的学习兴趣也能够保持更长时间, 因而也更容易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取得成功。[6]而持“工具性动机”的学习者常常是因为一门外语可以带来升学、工作或者经济利益等原因去学习, 并没有太多个人兴趣或者对目的语文化感兴趣等因素, 长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持久性可能就稍逊于前者。

## 3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教学

### 3.1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因素

对外汉语教学指的是对母语不是汉语的外国人所进行的汉语教学, 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或者外语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汉语听、说、读、写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目的是培养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6]要达到这里提到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以及“语言交际能力”, 都要求我们把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理应成为语言教学的重要目标。因此, 国际中文教育中, 如何进行文化因素的教学才能更快速、高效的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是要思考的问题。

目前,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教学形式大体有两种: 一种是设置专门的介绍中国文化的课程: 比如中国的书法、历史、建筑等课程, 这种课程可以涉及的范围非常广, 但是学生必须要具有一定的汉语水平, 时间和兴趣才能够保证学习效果, 而且这类课程也要求教师具有一定的相应专长或专业背景, 对师资有一定的要求; 另外一种是在语言教学中进行文化教学, 这种方式也被成为对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因素的教学, 显然, 不管有意无意, 这种方式是语言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方式进行的文化因素往往比较分散, 不成体系。[7]两种

方式中, 目前的国际中文教育中常常采用的是第二种。

另外, 张占一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划分为“交际文化”与“知识文化”, 并且认为“交际文化”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点, 这种观点也更加凸显了作为语言教育的国际中文教育的文化教育的特征。[8]从两种文化教学的关系来看, “知识文化”的教学不会对语言交际产生过大的影响, 但是“交际文化”的教学却可能对交际产生直接影响, 可见, 在文化因素的教学, “交际文化”的教学比较重要。因此, 在国际中文教学过程中, 要重视涉及“交际文化”内容的教学, 因为这部分内容可能会影响交际过程中信息的有效传递, 甚至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引起交际冲突。并且, 跨文化交际本身就是一种综合的、复杂的交际行为, 我们不仅要重视这个过程交际文化的培养, 更要注意到对于学习者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在交际文化的教学中潜移默化的传递给学习者文化或许有差别, 但是其地位无高下之分, 尊重不同文化的宝贵的跨文化意识。

### 3.2 文化因素的选择

从文化的定义来看, 文化是无所不包的。但是汉语教学实践中要做到无所不包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 在教学中, 要对文化内容做出一定的选择。什么类型的文化内容适合包含在文化因素的教学, 大体应有以下几种:

首先, 最迫切的应该是可能会影响正常交际的内容, 这部分内容应该包括基本的日常场景中的交际用语, 交际礼仪等[1], 比如: 对老师, 尤其是年长的老师讲话要以“您”称呼, 课堂上对于老师的讲课方式不习惯, 希望老师做出调整时, 最好课后私下沟通而非课上指出, 类似的场景还可以扩展到公司与领导沟通等情况; 或者中国人打招呼时习惯问: “去哪儿啊”? 这种方式更多的是一种问候, 只需要简单回答即可。有关交际礼仪方面的内容比如: 家里来客人吃饭, 对于美国人来讲, 一般要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 否则就表示客人不喜欢主人提供的食物, 实物不好吃, 都不想吃完。而在中国, 这样做可能会让主人误以为没有给客人准备足够的食物, 没有让客人吃饱而感到尴尬。另外还有客人离开时, 一些国家的做法是道别后就关门, 而在中国, 人们往往送客人出门, 道别后至少看着客人走进电梯, 才关门。客人离开后马上关门很容易被视为主人不欢迎客人或者希望客人马上离开。这里列举的内容都是关于日常场景中的交际用语或者交际礼仪, 如果忽视了这些文化因素的教学, 很可能引起误解甚至文化冲突, 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第二类内容是学习汉语时与文化有关的词汇, 成语和熟语等, 这类内容时无法避开的, 学到了这个词或者成语, 往往需要解释一下它们所代表的含义, 否则学生不理解这个词或者影响学习效果。[2]比如学习了“长城”、“黄河”等词语, 如果不解释一下“长城”和“黄河”背后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那么

学习者很可能就将其作为一个建筑或者一条河流，无法理解其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可能会让学生在阅读交流时丢失重要的语境信息。成语和熟语比如：画龙点睛，唱白脸等，也需要适当加入关于中国文化中的龙、京剧等文化因素的解释，才能让学习者季节这些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意义并且正确的使用它们。

第三是关于风俗习惯的文化，具体包括民俗、节日和婚丧嫁娶等习俗。[1]比如：中式婚礼中，有一些至今仍然沿用的习俗，像是准备栗子，红枣等干果、新郎新娘第一次公开称呼对方父母为“爸爸”和“妈妈”、给宾客分发糖果、贴喜字等。这些习俗的背后都有其特别的意义，寓意者亲朋对新人婚后生活的美好祝愿。更常遇到的是生活中一些重要的节日，像是春节包饺子，贴春联、常被给晚辈压岁钱；中秋节赏月、吃月饼；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等各不同习俗，无论是其中的饮食习惯和文化，还是举行的活动背后，也都有其演变和传承。了解这些文化习俗的内容，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的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能够宣传中国文化。

第四，了解中国文化中包含的哲学，价值观和思维等文化因素；学习这一部分内容的必要指出在于，它们是隐性的，但又无处不在的影响者语言、日常生活和行事和交际行为；不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和思维，也就无法恰当的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出示方式，更谈不到恰当的运用汉语交际；比如：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受其影响，在完成分等级的问卷时，如果有“中等”或者“中间的选项”，大部分人会选择“中间的选项”；在他们的观念中，“高处不胜寒”、“枪打出头鸟”，中间的往往是最适合的选项。此外，在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他们更愿意为了国家或者集体利益牺牲部分个人利益，像是疫情中医务人员离开家人，不顾个人安慰参与到抗疫工作中。

第五，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国家，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对于学习者也是非常重要的。[1]唐朝时中国历史朝代中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深深影响了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对中国的印象，以至于现在在国外中国人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唐人街”。这些相关的文化发展都对汉语中的词汇，成语等语言发展有重要影响。

### 3.3 选择文化因素的原则

根据上述内容将文化因素大致分为不同种类后，并不意味着上述内容就可以全部教给学习者，那样也是不顾教学实际限制的。因此，教学实践中的文化因素的选择还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首先，应当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内容：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不同地域气候，习俗不尽相同，这一地区适用的习惯到了另一地区可能就变得完全不同；因此，汉语教学中的文

化因素应当注重选择通用的，有代表性的内容。[1]中国的少数民族众多，各个民族之间文化和习俗都有差异，但是汉族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主体，因此，在教学时间和条件有限时，最好先关注与汉族习俗等相关的文化内容。过度追求全面和多样只会加重学习者的负担，另人无所适从，不利于语言教学。

其次，选择共时性的文化因素。中国历史悠久，制度、礼仪和习俗等都有其历史传承演变。如果关注点不是其演变的过程，那么就要优先选择现在仍然适用的内容。比如中国人的自谦，受到夸奖时习惯说“哪里哪里”，这一表达已经慢慢演变成大方接受并且说“谢谢”。教学实践中，前者的内容就可以不用特意提及。还有一些历史当中存在的词汇，比如“牙婆”，“买办”等，如果不是涉及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些词汇大多已经不再作为常用词汇使用，因此，关于这部分内容可以不作为文化因素选择的重点。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国际中文教育最根本是语言学习，因此，文化因素的选择要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根据语言教学的进度及程度选择适当的文化内容；过早、提前前的文化教学很可能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甚至让他们反感。[1]根据教学内容选择教什么，教多少，让文化促进语言学习，才是文化教学的应有之义。

### 参考文献

- [1] 乔琪琪，《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导入研究》，[D]，2017，经纶文献
- [2] 武和平，《作为核心素养的文化意识培养及文化教学》，[]，《英语学习·教师版》，2015年第12期
- [3] 林国立，《构建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因素体系》，[]，《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期，17-28
- [4] 周佳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影响与教学构建研究》，[]，《高教学刊》，2018年第24期，118-120
- [5] 赵杨，《第二语言习得》，[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5月
- [6] 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概论》，[M]，2004，商务印书馆
- [7] 马晓文，罗家国，《汉语国际教育文化教学改革初探》[]，《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4月，第36卷第2期，65-68
- [8] 赵炜，《近三十年对外汉语文化大纲研究述评》，[]，《华文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2期，总第78期，71-77